

烟台市胶东文化研究会
胶东特色文化推进办公室 系列图书

芝罘学校

1881—1951年之间的历史和回忆

[加] 高登·马丁(Gordon Martin) 著
陈海涛 刘惠琴 译注



齊魯書社

烟台市胶东文化研究会
胶东特色文化推进办公室 系列图书

芝罘学校

1881—1951年之间的历史和回忆

[加] 高登·马丁(Gordon Martin) 著
陈海涛 刘惠琴 译注

齊魯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芝罘学校:1881—1951年之间的历史和回忆/(加)马丁(Martin,G.)著;陈海涛,刘惠琴译注. —济南:齐鲁书社, 2013.9

ISBN 978-7-5333-2885-6

I. ①芝… II. ①马… ②陈… ③刘… III. ①芝罘学校—校史—1881~1951 IV. ①G522.7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99007号

芝罘学校

——1881—1951年之间的历史和回忆

[加]高登·马丁(Gordon Martin) 著

陈海涛 刘惠琴 译注

出版发行 齐鲁书社

社 址 济南市英雄山路189号

邮 编 250002

网 址 www.qlss.com.cn

电子邮箱 qilupress@126.com

印 刷 济南众森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20mm×1020mm 1/16

印 张 15

插 页 2

字 数 253千

版 次 2013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33-2885-6

定 价 38.00元

M U L U

原著前言 /001
作者前言 /002
原著出版说明 /005
芝罘学校校歌 /007
芝罘学校综述(译者序)/009
第一章 荣耀的芝罘学校 /029
第二章 从疗养院到芝罘学校 /035
第三章 芝罘学校琐事 /044
第四章 麦卡锡校长时代(上)/063
附 芝罘校友之歌 /078
第五章 麦卡锡校长时代(下)/079
第六章 学校的船 /104
附 芝罘学校赛艇比赛之歌 /118
第七章 布鲁斯校长时期 /120
第八章 “通州”号海盗劫持事件 /160
第九章 其他人的记忆 /165
第十章 被囚禁的岁月 /173
第十一章 预备学校的补充材料 /199
第十二章 芝罘学校的重建 /207
译者后记 /231

原著前言

我们高兴地看到,高登·马丁先生讲述的关于芝罘学校故事的这部著作,现在终于要付梓了。

关于这所我们希望急切了解的、被称为“苏伊士运河以东最好的英文学校”,作者经过认真的整理和详细的调查,用通俗的语言,为我们描述了它的历史。同时,值得我们鼓励的是,在这部书中,他还收录了一些自己所创作的关于这所学校历史的素描和诗歌。

在这部书的撰写过程中,作者曾联系了许多芝罘学校的校友,来帮助他共同完成这项工作。非常高兴的是,作者得到了他们的热情和快速的反馈,在他们的来信中,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和线索,同时表达了他们对高登·马丁先生所从事这项工作的敬意和期盼。有一位校友就写道:“在芝罘学校上学的时候,无论高登·马丁先生给我们教授的哪一门课,都是那么的有趣,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也相信,通过阅读这本书,广大读者也会有这样的感觉。我们还要感谢那些芝罘学校的校友,仰仗于他们的无私和慷慨,才使这本书的出版成为可能。他们是:

吉米·布鲁斯(Jimmy Bruce),1931~1932、1938~1944 年在校校友;

诺曼·克里夫(Norman Cliff),1931~1941 年在校校友;

戴维·兰保夫(David Landsborough),1926~1931 年在校校友;

若兰德·斯泰德芙(Roland Stedeford),1939~1945 年在校校友。

作者前言

多年来,生活在英国和加拿大的许多朋友,都急切地希望我,能够撰写一部关于芝罘学校历史的书籍。环顾四周,也的确找不到其他人能够比我更有资格和条件,去承担这一困难和重要的任务。

芝罘学校对我太亲切了。我虽然也曾经任教于芝罘学校之外的其他几所学校,其中有两所也具有非常良好的声誉,即位于霍尔特(Holt)的格雷欣学校(Gresham's School)和布里斯托文法学校(Bristol Grammar School)。格雷欣学校不论从哪个角度说,都是最好的学校之一,富有创新精神,师生之间关系和谐融洽,拥有让人钦佩的高尚道德传统。布里斯托文法学校则在优秀的学术传统上享有良好声誉。鉴于我对上述两所学校的熟知,以及我所拥有的良好背景,可以有资格来客观评价芝罘学校的教学标准和办学成绩。我要说,因为受制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其中既有环境的影响,也有我们自身的选择,但是我敢断言,至少在我本人任教于芝罘学校的那些年代,芝罘学校是一所充满活力的、不断发展的、不断成长的优秀学校。

我与芝罘学校发生关系,其实在我前往那里任教的1929年之前很早就开始了。我的父母就是中国内地会的传教士,他们希望自己的一生都能在中国度过,这样,我和我的兄弟们就极有可能都会成为芝罘学校的学生。我也的确在家中看到过,父母为我哥哥前往芝罘学校上学而准备的全套行装。但是,中国内地会不久后指令我的父母留守在英国伦敦,专门负责中国内地会传教士训练营地的的工作,并在此后的30多年中,他们一直负责这项工作。我的父亲还



曾作为中国内地会总会的秘书长,从事了大量的总会管理工作。

这些背景在许多方面都对我产生了影响。首先,我在伦敦就读于一所非常优秀的学校;而后,我进入著名的英格兰公校泰勒商校(Merchant Taylor's School),并在那里获得了奖学金后,直接升入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St. John's College)。其次,我们家与中国内地会英国总部比邻而居,我自然与他们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关于中国内地会的运营费用,根本不用他们去发动捐款,只要需要,以上帝的名义,总有稳定而充足的捐献。在这里,我经常会遇到回国休假的中国内地会传教士,特别是弗兰克·麦卡锡(Frank McCarthy)先生,我还在英国读书的时候,就和他有过多次的碰面。第三,因为家庭环境的关系,我认识很多前往中国的年轻人。因此,当我来到芝罟学校任教时,我发现我有一个优势,那就是我所教授的许多孩子的父母,其实在多年前我和他们就相识。

我似乎认为,我拥有其他传教士所不具有的某些优势,来培养这些忍受着与父母分离苦难、生活在异国他乡、面对气候差异、缺少健康和安全感的孩子。在整个牛津大学学习期间,我一直都在关注中国内地会的发展情况,开始为以后前往中国工作做准备。在我的大学宿舍中,到处都装饰着来自中国的东西。

就这样,我用各种方式做准备,以便能更好地承担任教芝罟学校的使命。我记得,在1928年,赫斯特(D.E.Hoste)先生(他曾经在戴德生之后,成为中国内地会的总干事)曾经有好多次和我谈到,奥斯汀(G.F.C.Austin)先生自1900年开始就在芝罟学校任教,此后在那里任教5年,他曾尽最大努力,试图将芝罟学校改造成为像我们在英国所称之为“公办学校”那样的一所大规模学校(因为这些学校在全国范围内招收学生,因此自然在规模和质量上要优于那种地方文法学校)。赫斯特先生告诉我,奥斯汀先生最为关注的东西,实际上是对芝罟学校最为有害的东西。他告诉我:“芝罟学校有它自己的特色,并不需要刻意去模仿任何其他学校。”就这样,在这样的背景下,我来到了芝罟学校,已经在心中做好准备,决定去接受芝罟学校的风格特点,这种多年来形成的风格特点,很大程度上说,实际就是校长弗兰克·麦卡锡先生的风格特点。1895年,当时的戴德生先生希望能寻找一位有能力、已婚、有卓越才能和完美品格的领导人,来管理中国内地会在烟台设立的芝罟学校的所有三所分校时,弗兰克·麦卡锡先生就顺利入选,作为校长,他从1895年一直服务到1930年。

芝罟学校给予了我丰富的人生经历。在那里,我与同事和学生们相处和

谐,结成难忘友谊,分享着信仰上帝的忠诚,体会着婚后生活的甜蜜和幸福。在我 23 年任教芝罟学校的生涯中,我几乎天天都在思考,除了在教室给孩子们上课,每天和孩子们一起游戏锻炼之外,我还能给芝罟学校做些什么。我努力去为孩子们扩展一些更为广泛的兴趣,正因为此,许多芝罟学校的校友可能拥有了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和知识,也可能让他们的眼睛看到和发现了更多艺术的魅力,也可能使他们的校园生活虽然被认为严肃,但绝不是单调沉闷。在芝罟学校的音乐会上,我虽然不能亲自演唱和演奏,来演绎音乐的魅力,但我可以用喜剧这一形式,带给他们轻松的心情,释放他们紧张的压力。诸如这些事情,我认为还是很有价值的。我希望我所描述的这部芝罟学校的历史,从 1881 年到 1951 年,虽然是严肃和沉重的,但绝不是单调和沉闷的,因为在我的记忆中,我们拥有过许许多多的快乐和欢笑。

我非常感谢芝罟学校的校友们,他们对这部回忆录的撰写提供了许多宝贵的资料和建议。特别是澳大利亚的老校友们,他们在这些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同时,我还要感谢安迪(H.J.Alt)先生(《芝罟学校简史》)和祝康宁(Frederick Judd)医生(《芝罟学校的历史》)他们对芝罟学校历史的记录。

因为我已经深陷于这段历史,恐怕在描述中,会有太多我自己的主观思想。我相信,本书中所引用的诗歌相比于单调的随笔,经历者亲手绘制的素描插图相比于照片,可能更能够体现出翔实的细节和更准确地再现当时的环境。对于此书中的素描插图和诗歌,我也曾努力去收集其他人的作品,但没有什么收获,我也只好用自己粗陋的作品了。希望读者能够见谅。

高登·马丁

作者简介:

高登·马丁(Gordon Martin)出生于中国西北,父母是当时在那里从事传教工作的中国内地会传教士。在他 4 岁的时候,随父母回到英国,在英国度过了他的童年并接受教育,先后毕业于著名的英格兰公校泰勒商校和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主修哲学和古典文学。毕业之后,成为一名英国文学、历史和拉丁文老师。从 1929 年开始,他来到中国,在中国内地会设在烟台的芝罟学校任教,一直到 1951 年芝罟学校随中国内地会撤出中国。

原著出版说明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参考了众多参考资料,其中有:

安迪(H.J.Alt):《芝罘学校简史》(*Short History of the Chefoo School*);

戴本利(Bently D.Taylor):《私人日记》(*Personal Diary*,未发表);

海恒博(A.J.Broomhall):《戴德生与开埠中国》(*Hudson Taylor and China's Open Century*, Hodder & Stoughton & O.M.F.1981~1989);

内维尔·顿卡(J.N.Duncan):《华北日报所记1935年“通州号”劫持事件》(*Report Tungchow Piracy in North China Daily News,1935*);

弗里克(Fairbank J.K.):《跃起的中国》(*China Bound*);

傅勒铭(Peter Fleming):《围攻北京》(*The Siege of Peking*,Rupert Hart-Davis, 1959);

鲍利·哈密尔顿(Pauline Hamilton):《成为一个不同的鼓》(*To a Different Drum*);

爱娃(D.Irwin):《上帝眷顾我》(*God Took Good Care of Me*);

祝康宁(Frederick Judd):《芝罘学校的历史》(芝罘校友联合会杂志)(*History of the Chefoo School*, C.S.A.Magazin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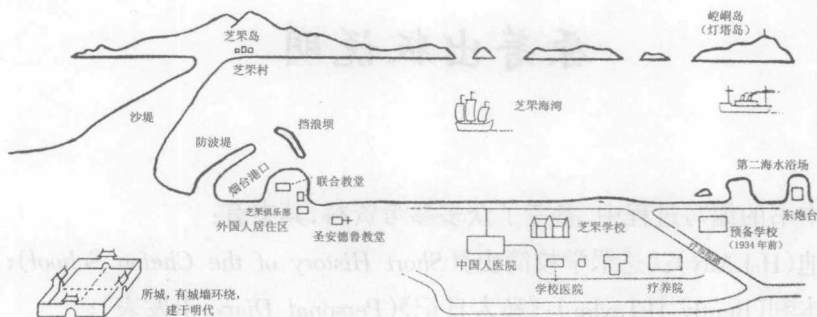
戴玛丽(Mary Taylor):《在潍县集中营的拯救之歌》(*A Song of Salvation in Weihsien Prison Camp*);

戴存义(Howard Taylor):《戴德生和中国内地会》(*Hudson Taylor &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 C.I.M.19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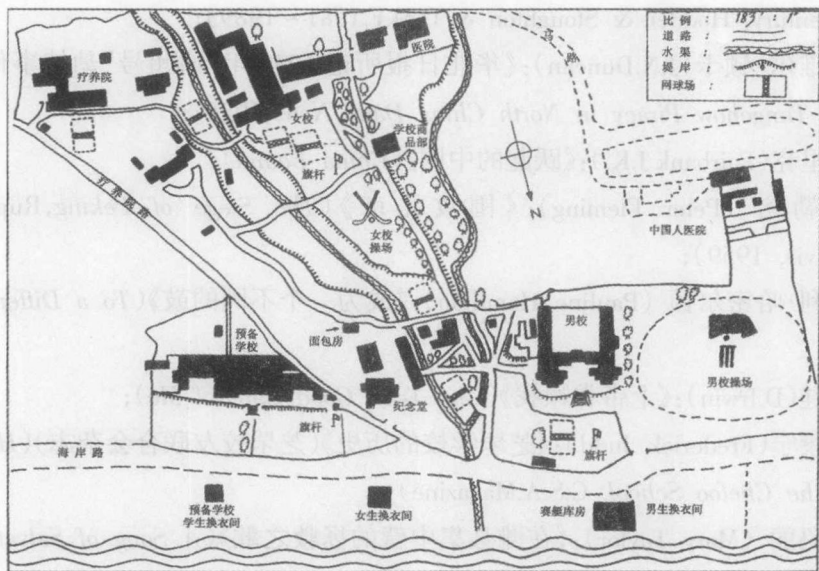
此外,还有芝罘校友联合会会刊(*C.S.A.Magazines*)、中国内地会(C.I.M)档案资料、海外基督使团(O.M.F)档案资料、《中国亿兆》(*China Millions*, 中国内地会、海外基督使团新闻月刊),以及大量芝罘校友的信件和文章。

读者能够显而易见地发现,本书中所出现的中国的地名,大多都是沿用老的名称以及老的拼写,这很容易理解,因为本书作者以及他的同事们,对他们

那个时代,也就是本书所描述的那个时代是更加熟悉的。同样,本书中的中国人名、地名等汉字的拼法,也是根据旧的威妥玛—翟理斯式拼音法(Wade Giles System)拼写^①。



◎芝罘学校位置图



◎芝罘学校平面图

①威妥玛—翟理斯式拼音法,简称威氏拼音,中国清末至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公布前,被广泛用于汉字注音,影响较大,是当时中国和国际上流行的中文拼音方案。发明这个注音系统的威妥玛(Thomas Wade, 1818~1895)是英国人,曾于19世纪末任英国驻华公使,1888年起在英国剑桥大学任教,讲授汉语,直至1895年逝世。威妥玛在华任职期间,根据北京读音,用拉丁文字母给汉字注音,后来经翟理斯(H.A.Giles)稍加修订,创立了威妥玛—翟理斯拼音法。1958年《现代汉语拼音方案》公布后,威氏拼音法被废止。但直到现在,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威氏拼音的许多痕迹,许多享誉海内外的品牌依旧用的是威氏拼音。如茅台酒“Moutai”,青岛啤酒“Tsingtao”,中华烟“Chunghwa”,张裕葡萄酒“Changyu”,清华大学“Tsinghua”,烟台(芝罘)“chefoo”等等。

芝罘学校校歌

我们颂扬伟大的学校，
你的美名使我们荣耀；
是你让我们认识世界，
并把毅力和勇气传授；
你赋予我们永恒知识，
给我们揭开自然神秘；
你教导我们不能气馁，
探索追求一直到永远，
勇敢承担我们的使命。

你就是那灿烂的明灯，
照耀在东方大海之滨；
你的儿女结神圣纽带，
紧紧依偎在你的怀中。

不怕刺骨北风如针扎，
何畏沉闷南风催人眠；
我们的队伍奋勇向前，
把敌人感化变成朋友；
迎风破浪跃起又抛下，
坚守中不惧颠簸摇摆；
相互帮助中收获快乐，
欢快的身影如同流星。

芝

罘

学

校

你就是那灿烂的明灯，
照耀在东方大海之滨；
你的儿女结神圣纽带，
紧紧依偎在你的怀中。

我们寄托着父辈期盼，
树立了一个崇高理想；
即使面对连日的苦难，
也不能玷污圣洁盛名；
耳畔常常会响起召唤，
那是众生求助的渴求；
奉献是我们不懈追求，
是你将我们永远指引。

我们寄托着父辈期盼，
树立了一个崇高理想；
即使面对连日的苦难，
也不能玷污圣洁盛名。

词曲作者：斯坦利·霍顿

芝罘学校综述(译者序)

在 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的烟台,一直存在着是一所非常奇特的学校,在这里,它已经存在了 60 年。在欧洲称为远东的中国地区,这所学校却完全采用严谨的英式教育制度,学期设置、课本选择、教授方法等全部采用英制,学校老师也全部由西方人担任,毕业考试坚持英国牛津统考,被誉为“苏伊士运河以东最好的英文学校”。但绝大多数中国当地人对它非常陌生,甚至同一时期的中文地方文献,几乎对它也没有什么记载。因为这所学校只招收外国人,特别是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简称 CIM)传教士的孩子。这就是烟台中国内地会传教士子弟学校,被世人更熟知的名称则是“芝罘学校”(Chefoo School)。

要说到芝罘学校,必然要先从它的创办者——中国内地会说起,但在此之前,还得先对当时烟台的西方教会活动情况做一简单的介绍。其实早在 1861 年烟台正式开埠之前,西方各教会就开始派出传教士来到烟台。根据 1937 年出版的《烟台概览》描述,最早来到烟台传播基督教者,是英国苏格兰长老会传教士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 1829 ~ 1890)夫妇。他们于 1855 年 9 月 24 日就来到烟台,在烟台通伸村设教会布道,同时设立男女学校、医院,还称其“颇有成绩可观”。除了在烟台的活动,此后,韦廉臣还是著名的上海广学会(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的创办者,这是英美基督教传教士 1887 年在上海成立的出版机构,广学会的书籍对清末维新运动和清末新政产生了很大影响。韦廉臣于 1890 年逝世于烟台,就葬在当时的毓璜顶西侨公墓,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在中国,尤其是在烟台的传教事业。但其实,早在《烟台概览》记载的 1831 年,就曾有一位英国基督教伦敦会的传教士、普鲁士人郭实腊(K.F.A.Gutzlaff, 1803 ~ 1851,生于东普鲁士,1826 年被荷兰传教会派遣前往



◎戴德生

爪哇传教,因向往来中国传教,于1829年脱离该会,1831年开始进入中国,在福建、广东等中国沿海各省游历布道,并多次参与中英外交事件),在其北上天津时,就曾驻足烟台。虽然没有记载他发展了什么教徒,但还是做了一些传教的工作,比如散发一些基督教宣传品。但现在很多研究者都认为,郭实腊并不单纯是个传教士,甚至可能就压根不是传教士,此行的主要目的也不是传教,而是搜集中国北方各港口的情报。因为在1842年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签订《南京条约》时,郭实腊就充任

英军翻译官,并于次年来到香港,接替刚刚去世的马儒翰担任华文译官。但至少,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清廷战败,签订《天津条约》之后,烟台这个新开埠的通商口岸,就以其优越的自然条件和重要的地理位置,吸引了大量西方各差会来烟台建立教会组织。其中主要有法国天主教会、英国浸礼会、美国南方浸信会、中国内地会、北美长老会、中华圣公会、英国圣经公会、苏格兰长老会等等。其中较有影响的,主要是北美长老会、法国天主教会、美国南方浸信会等,中国内地会其实规模和影响都是较小的。

下面该详细说说中国内地会了。中国内地会虽然名称中有“中国”二字,却是完完全全由英国人创办的教会,更确切地说,是为了向中国传教而专门成立的教会。中国内地会,其创始人为英国传教士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 ? ~ 1905)。1854年,戴德生在前述英国传教士郭实腊的感召下,作为英国基督教伦敦会的传教士来到中国,先在上海、汕头等地传教。1857年定居宁波后,成立了独立的“宁波差会”。1860年,戴德生回到英国,开始招募传教士,两年后他将在英国布莱顿招募到的宁波差会第一位志愿者宓道生(James Meadows, 1835 ~ 1914)派遣回宁波。1865年,戴德生将宁波差会改名为“中国内地会”,简称“内地会”。

作为一个跨宗派的基督教新教差会,就如同其名称所反映的,中国内地会是特别为在中国内地传教而设立的。其背景是:当时来华的西方传教士,主要是在中国沿海的各通商口岸及其邻近地区传教。虽然《北京条约》签订以

后,允许西方传教士自由到内地传教,但大部分的传教士都还是分布在中国的沿海地区,遍布于从东北地区到南边的广东,很少有传教士能深入到相对条件艰苦、信息闭塞的中国内地去。针对这种情况,中国内地会确立其宣教方针,就是要招募一批可以全家迁到中国内陆地区长期工作的传教士,目标是希望在中国每一个省份都至少有一对传教士在传播基督信仰,所以称之为中国内地会。中国内地会在中国内地的传教也非常有特色,在中国内地,内地会的传教士们打破语言、文化和生活方式的隔阂,克服重重困难建立教会。比如,为了能够融入中国社会,内地会的传教士来到中国后,甚至改穿中国服装,并梳中国发式(去发留辫)。为此,戴德生甚至被英国国内的一些人士指控叛国。戴德生曾有句名言:“我若有千镑英金,中国可以全部支取;我若有千条生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不,不是中国,是基督!”可见其对传教事业的虔诚与决心。



◎中国内地会传教士出发前的合影

1866年,以中国内地会名义招募的第一批传教士在戴德生的率领下,乘坐“兰茂密尔”(Lammermuir)号轮船,启程前往中国,同年9月抵达上海,开始了内地会在中国的大规模传教活动。最初,内地会的总部设在杭州,1890年迁至上海。该会在伦敦的银行开户时,仅仅储存了10英镑作为基金,可谓举步维艰。但是,他们在宗教传播方面的成就是令人钦佩的。最初,中国内地会的影响

只是在沿海一带,后经过努力,几乎中国每个地方都有他们的影子。内地会的传教士来自众多国家,不在乎生活条件艰苦,不受宗派、国别的限制,很快在中国就打开了局面。在传教过程中,内地会传教士以传播福音为主,以教育和医疗为辅助手段,不太注重大规模地建立学校和医院。他们甘心吃苦,即使遇到官方或民间的打压和抵制,也不向本国政府求助得到特权支持,而且也不威胁地方索取赔偿,尽可能融洽与当地的关系,采取春雨润物的方式渗透到中国民间社会,这一点使他们与其他在华传教团体有很大差别。虽然内地会在中国的上层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在中国社会下层的影响很大。这种模式被称为“戴德生模式”,成为西方所谓“信心差会”和内地宣教的榜样。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内地会在中国各地的传教活动成绩斐然,活动范围几乎覆盖整个中国,其中在安徽、四川、贵州、甘肃、陕西、云南、河南等省,基督教的传教局面都是由内地会首先开辟,最远抵达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至1912年,在中国活动的内地会传教士数量超过1000人,成为在华最大的传教机构。到1927年1月,内地会在中国所建立的传教点达到了937个。



◎戴德生与中国内地会传教士,中间坐者为戴德生,可以看到其中很多人是中式衣着

1951年,内地会开始从中国大陆撤出,到1953年撤退完毕,所有传教士重新部署在东亚其他地区,并在新加坡建立了新总部,机构名称也改为中国内地会海外传教团(The China Inland Mission Overseas Missionary Fellowship),依然坚持以“中国”命名。直到1964年,中国内地会才更名为海外基督使团(The Overseas Missionary Fellowship 或 OMF International),终于放弃了中国内

地会的名称。现在海外基督使团有大约 1000 名传教士,分别来自日本、韩国、菲律宾、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巴基斯坦及中国的台湾、香港等地,并坚持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开展传教活动。



◎传教士勃沙特



◎传教士成邦庆

内地会在中国内地的传教过程中,还发生过一件有意思的事。1934 年 10 月 1 日,中国内地会派往贵州的瑞士籍传教士勃沙特(R.A.Bosshart,中文名薄复礼),当时担任贵州镇远教堂牧师,夫妇二人从安顺返回镇远,经过城外一个山坡时正好与从江西长征到贵州的由贺龙和萧克率领的红六军团相遇,无意间闯入了红军的队伍,被当做“间谍”扣留。10 月 2 日,红军攻破贵州旧州,来自新西兰的中国内地会传教士成邦庆(Arnolis Hayman,或直译为“海曼”,1890~1971)牧师一家,包括两个孩子以及暂住在那里的加拿大籍传教士林荣贞小姐(Grace Emblen)都被红军扣留,跟勃沙特夫妇关押在一起。此后不久,红军将其中所有妇女和孩子释放,要求勃沙特和成邦庆跟随部队行进。就这样,成邦庆和勃沙特以“帝国主义间谍罪”囚犯的身份,参与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伟大的一项壮举。据说,当时红六军团正面临着重重包围,国民党军企图将红军一网打尽,红军又迷了路。在这生死关头,红军在这偏远的山坡抓到了勃沙特。勃沙特帮助红军找到了出路,还为红军翻译了一张法文版贵州省地